

# 聖主明君的形塑與文物的再詮釋

## ——論乾隆重刻石鼓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  
書畫處

### 提 要

「石鼓」是三代重要刻石文物，更是闡揚儒家思想的重要象徵。乾隆五十五年，八十歲的乾隆皇帝敕令集石鼓文尚存的三百一十字，重排石鼓詩十首，又重刻石鼓，鼓面以石鼓文摹刻重排石鼓詩。本文嘗試以乾隆重刻石鼓為核心，及後續一連串相關的儒家經典之刻石舉動，用來說明乾隆皇帝除了宣示自身在文化道統上的權威，也極欲在八十五歲歸政前成就所謂「文成武德」，更顯示在執政後期乾隆皇帝是如何有意識地自我形塑己身是一個文成武德的「聖主明君」。

至於乾隆皇帝重刻石鼓此一盛事，流風所及，亦帶動了相關書法作品的收藏，更由於乾隆時代仿古風氣之盛，與重刻石鼓相關文物的出現，是極佳的範例來說明此類仿古文物所被賦予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乾隆、石鼓、道統、仿古

## 前 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有兩組以「石鼓」為名的文玩，一是石鼓硯，一是青金石石鼓，均屬清宮舊藏。兩組鼓面皆刻石鼓文，歷來對兩組珍玩著墨不多，僅以外觀描述，並簡略說明舊石鼓。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收有一組類似的石鼓硯，同樣也以仿石鼓說明，對於鼓面上的文字，則記：「十件鼓硯分別刻秦石鼓文釋文與原文」，<sup>1</sup>考三組石鼓文玩鼓面所刻石鼓詩，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乾隆皇帝御令集舊石鼓所存文字加以重排的石鼓詩，並與現存於北京與熱河孔廟的乾隆石鼓，形制相似，僅尺寸與材質不同。衆所周知，十枚「舊石鼓」是千古重器，無論在歷史、文學、書法等方面皆有無可匹敵的崇高地位。何以乾隆會在乾隆五十五年選擇石鼓重刻？

梳理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以探究更深層動機及歷史意義，是本文的目的之一；其次，何以乾隆賦予新刻石鼓這樣的造型？不僅是對石鼓重新詮釋的再現，也與乾隆朝盛行的仿古風氣有相當的關連，因此本文另一目的，是以乾隆重刻石鼓所衍生出的各類文物為例，了解乾隆時期仿古文物的特性，以及此一千古重器是如何透過乾隆的詮釋呈現具有時代意義的全新風貌。

由於乾隆皇帝是清初盛世的重要帝王之一，歷來關於乾隆皇帝生平事蹟之研究成果，所在多有；不過，關於乾隆重刻石鼓一事，長久以來並無專論，僅梅韻秋於博士論文中小篇幅的論及石鼓與乾隆重刻石鼓此舉的政治目的，礙於論文的焦點並非在此，是以討論有限；<sup>2</sup>此外，賴毓芝於〈文化遺產再造：乾隆皇帝對於南薰殿圖像的整理〉一文，闡述乾隆皇帝藉由整理南薰殿歷代帝王及聖賢像，重建道統以合理滿人統治的政治目的，<sup>3</sup>與本文選定「重刻石鼓」為題，探索更深層歷史意義，有異曲同工之處。康無為在〈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品味與異國奇珍〉中，以文化的觀點說明乾隆皇帝品味及特有風格的形成，是一種「權力的論域」（a discourse of power），<sup>4</sup>提供乾隆時代特定風格形成的重要觀點。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

1 趙麗紅，〈端石做古石鼓硯〉，《遼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做古文物精品特集》，頁 304。

2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p. 215-216.

3 賴毓芝，〈文化遺產再造：乾隆皇帝對於南薰殿圖像的整理〉，頁 75-102。

4 康無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品味與異國奇珍〉，《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頁 57-72。

中點出乾隆朝的文化政策在「維護清朝統治權，提升乾隆自身的皇權以及用行政力量來為皇帝文化上的興趣、嗜好與品味服務」，<sup>5</sup>正可以用來理解重刻石鼓此一文化政策之目的。至於討論乾隆朝仿古文物，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說明乾隆對於「仿古」形式玉器的選擇與提倡，以影響文化政策的執行。<sup>6</sup>《遼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做古文物精品特集》是乾隆時期宮廷仿古工藝之專書，後有三篇專論，其中劉岳〈玩物仍存師古情——試談乾隆時期宮廷工藝做古風格的成因與特點〉一文，對於乾隆時期仿古風格的成因與特點有提綱挈領的分析。<sup>7</sup>

以上所列舉之專論，或有部份與本文研究相關，但皆與本文研究宗旨未盡相符，故本文可謂對於乾隆皇帝文化事業與生平事蹟研究另闢蹊徑之舉，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 一、「石鼓」及其歷代流傳

所謂「石鼓」（圖 1）是指唐初在天興縣（今陝西省寶雞市）南二十里許處所發現十個似鼓形的石頭，每鼓高約 90 公分，直徑約 60 公分，鼓側環刻四言散文詩一首，十鼓共十首，內容記述游獵之事，屬於有一定次序且分章連屬的長篇敘事詩。在唐代被認為是周宣王時史籀所書，由於年代久遠且形制特殊，再加上文字奇古、筆法飛動，通篇體勢渾穆森然，無論在文學、書學、史學以及文字學等方面皆有難以匹敵的重要地位，著名唐代文人杜甫、韋應物與韓愈以及宋代蘇軾皆曾為之賦詩，堪稱「天下第一刻石」。

由於「石鼓」所刻之事相關史籍缺載，使得刻石的時間，歷代說法不一，如依各種說法時代先後排列，則歐陽修《集古錄》引韋應物說法，以為是周文王時代（前 1152-前 1056）的紀事，至周宣王時代（前 827-前 782）始刻石；宋人董道、程大昌據《左傳》記載，主張是周成王（前 1042-前 1021）時代刻石；唐代韓愈則以為是周宣王時代的刻石；宋人鄭樵認為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前 770-前 221）；元人陸

5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頁 217-229。

6 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頁 61-116。

7 劉岳，〈玩物仍存師古情——試談乾隆時期宮廷工藝做古風格的成因與特點〉，《遼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做古文物精品特集》，頁 410-414。

友仁據《北史》，主張是元魏時代（502）；金人馬定國據《後周書》，認為屬於西魏北周宇文氏（535-581）。

至於民初學者，首先由馬衡提出石鼓是先秦石代的刻石，<sup>8</sup>此說一出獲得學界認同，但確切刻石年代仍是眾說紛紜，如郭沫若則認為是秦襄公八年（前 770）所刻；羅振玉、馬敘倫主張是春秋時代秦文公（前 765-前 716）所刻；唐蘭則以為是秦靈公時代（前 424-前 415）或秦獻公時代（前 384-前 362）的刻石。當代學者依石鼓文字、內容、文體、書法及史實等進行研究考證，大抵主張石鼓應屬春秋中晚期時代之際，大約秦景公時代（前 576-前 537）之物，其說可信度似乎較高；<sup>9</sup>但確切的刻石年代仍有待進一步地考證。石鼓上所刻文字是屬於春秋時秦國的大篆，且由於刻於形似石鼓的石頭上，因此以「石鼓文」名之，為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石刻文字。

石鼓在唐代被認為是周宣王時所作，可視為三代碩果僅存的重要刻石文物，是以韓愈視石鼓為「至寶」，在〈石鼓歌〉中有「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等句，倡議將「石鼓」置於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太學」。事實上，東漢靈帝時就曾將官定版本的《魯詩》、《周易》、《尚書》、《儀禮》、《春秋》、《公羊傳》及《論語》等儒家經典以隸書刊刻成〈熹平石經〉，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前；三國魏廢帝正始年間則有《三體石經》以古文、小篆、隸書刻《尚書》、《春秋》及《左傳》三種，同樣立於洛陽太學；唐文宗則於太學立《開成石經》，是以楷書刻儒家經典：《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等十二部。這些儒家經典內容、文字乃至書體都是經過官方訂正校勘後刊刻，正所謂「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除了教科書的實用性外，更有弘揚儒學的作用。

因為石鼓所刻內容與周代禮樂制度的記載相關；文體與《詩經》四言敘事詩相類；字體是如「珊瑚碧樹交枝柯」的古文大篆，故韓愈建議將之置於國家最高的教育機構，用來闡揚儒家思想的象徵意義不言可喻。「石鼓」屬於儒家所稱的三代遺物；「石經」則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兩者皆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儘管唐廷並未採納他的提議，此後隨著朝代更迭幾經遷徙與散失，元以後則沿襲此意，據《元史》所載元

8 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凡將齋金石叢稿》，頁 165-175。

9 徐寶貴，〈石鼓的年代〉，《石鼓文整理研究》，上冊，頁 606-704。

仁宗皇慶元年（1312）「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sup>10</sup>而元潘迪〈石鼓音訓碑〉則清楚說明「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sup>11</sup>到了明代，楊士奇曾記石鼓「在今北京國子監」<sup>12</sup>蔣德璟則云：「往戟門內觀石鼓，左右各五……元皇慶初，移置今所，本朝因之。」<sup>13</sup>明代時石鼓是因襲元代所放的位置並未移動，置於戟門下，到清代，乾隆有「周宣王獵碣十，今在太學戟門下」<sup>14</sup>及「石鼓為千秋法物，自元大德間移置國學大成門，世為藝林珍祕」等記錄，可見清初仍舊是沿續元、明兩代置於太學「戟門」下，又據《欽定國子監志》周石鼓是置於大成門內左右兩側，並有元潘迪〈石鼓音訓碑〉（圖2）。<sup>15</sup>即今日北京孔廟大成門內（北面）放置二十四列戟之處（圖3）。

## 二、考訂石鼓

「石鼓」不僅為三代遺物，也是弘揚儒學重要象徵，所刻大篆更是珍貴的文字資料，再加上結字奇古筆力雄健，使得「石鼓」成為歷代書家所臨習的對象，基於石鼓在訓詁、文史、藝術等領域之重要性；也因此對藝術、文學與經史考據等各方面有濃厚興趣的乾隆皇帝理所當然會注意石鼓，在〈重定元榻石鼓文識語〉有「周宣王獵碣十……歲己巳（乾隆十四年），曾榻本，題長句，匣貯乾清宮」<sup>16</sup>等語，可見乾隆十四年時，乾隆曾命人摹榻大成門內的十枚石鼓，將榻本存放於乾清宮（以下稱〈乾清宮本〉）。不僅如此，因自唐以降，歷代對於「石鼓」意見分歧主要有三：一是歷代石鼓榻本的校讎；二是石鼓的刻石年代；三是石鼓次序的排定；針對這三個問題，乾隆對石鼓進行相關考訂：

### （一）石鼓文榻本的校讎

乾隆對於石鼓文榻本的校讎，可以分為兩部份，一是對內府所收〈元榻石鼓文〉

1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紀〉，頁550。

11 此碑內容見拓本，〈元潘迪石鼓文音訓碑·碑音〉，《石鼓と秦漢の碑刻》，頁39。

12 （明）楊士奇，〈書石鼓文後〉，《東里集》，卷十一，頁127。

13 （明）蔣德璟，〈石鼓小記〉，收於黃宗義編，《明文海》，卷三七六，頁356-357。

14 〈元榻石鼓文〉，《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560。

15 （清）文慶、李宗昉等纂，〈廟志一·廟制圖說〉，《欽定國子監志·上冊》，卷一，頁38。

16 〈重定元榻石鼓文識語〉，《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560。

冊進行比對，據《石渠寶笈續編》所錄，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收得〈元榻石鼓文〉冊，上有趙孟頫音釋，更有趙氏篆書韋應物、韓愈與蘇軾詩，更有元明兩代人跋語，而爲此乾隆做〈題元榻石鼓文〉七言詩：

己巳榻藏石鼓辭。及存真蹟奔珍之。訝觀元代趙家印。重讀唐時韓氏詩。  
居上後來寧避諱。為雄積健信稱奇。收三百又加旬者。多四十還餘六茲。  
節化智營二以外。文乎宣也古惟斯。商彝夏鼎方伯仲。片羽吉光永陸離。  
龍爪雲中幻隱現。蚪文劫後尚留遺。淵明甚解不求處。向闕其言用此宜。<sup>17</sup>

由此詩可知當時乾隆對於石鼓的看法，前兩句是說明乾隆十四年榻藏石鼓一事，第三至六句，說明他觀看〈元榻石鼓文〉冊，並讚美石鼓文字的雄奇，接著說明元榻比起〈乾清宮本〉的三百一十字榻本多了四十六字，除了《淳化閣帖》中〈夏禹書〉與《丹鉛錄》中〈峒嶼碑詩〉外，周宣王時的石鼓是年代最爲久遠的，與商彝夏鼎等三代銅器的重要性在伯仲之間，如同片羽吉光般，彌足珍貴。之後形容石鼓文如同雲中若隱若現的龍爪，也感嘆石鼓在歷經時代更迭並幾經遷徙散佚後仍存留，最後以陶淵明不求甚解的典故，對於石鼓自唐以來衆說紛紜的時代問題，以闕疑的態度暫時擱置。

據前引《石渠寶笈續編》的記錄，乾隆四十八年收得元榻時就命人詳細與〈乾清宮本〉互相比對，並記錄每鼓比對後的差異，並跋於冊後。經比對元榻有三百五十六字比〈乾清宮本〉多了四十六字。又據冊後跋文說明，依明人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載，北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時石鼓仍存四百六十五字，元代至元時（1335-1340）則有三百八十六字，劉侗所見明代榻本則只有三百二十五字，依榻本所存字數此冊應是元榻，而〈元榻石鼓文〉冊是當時清宮所見年代最早的榻本，且「紙墨精潔，所榻字畫，渾厚高古」，<sup>18</sup>比起〈乾清宮本〉字口磨泐漫漶，來得更有意義，經比對後多出的四十六個字，每一個都如同驪珠般珍貴。

## （二）石鼓刻石年代的考證

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乾隆似乎又對考訂石鼓產生興趣，於〈元榻石鼓文〉冊後，書寫識語表明其動機：「……茲幾暇兼取舊藏太學者相校，則甲乙參互，

17 前引書，頁 560。

18 前引書，頁 561。

檢閱爲艱，思折衷以定一……」，<sup>19</sup>可見乾隆在處理政務餘暇將乾隆十四年之榻本與元榻相互參校，有感於校閱過程頗爲艱難，亟欲定論石鼓。第一步就是處理刻石年代的問題，並提出具體看法：

夫石鼓之聚訟久矣，蘇勗、竇泉、張懷瓘、韓愈、蘇軾以爲宣王鼓；韋應物以爲文王鼓宣王刻；董道、程大昌以爲成王鼓；鄭樵以爲秦鼓；馬定國以爲宇文周鼓；然自元至今，定爲宣王鼓無異辭者。以車攻馬同合於小雅故也。<sup>20</sup>

他列舉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但沿襲元以來的看法，認爲石鼓〈車工〉篇與《詩·小雅》〈車攻〉篇中皆有「車」、「攻」、「馬」、「同」四字，且語法相似，再加上詩·小雅〉〈車攻〉篇是周宣王時的作品，<sup>21</sup>故將石鼓定爲周宣王時之刻石。

### （三）石鼓次序的排定

乾隆五十四年除了考訂石鼓年代，乾隆也按元人潘迪所作〈石鼓文音訓〉的順序，重編〈元榻石鼓文〉冊的次第。在此冊識語中乾隆說明重定原因：

……宋在稽古閣，金在王宣撫宅，誰能摩挲而排比之。元皇慶始移國子監，至元間，潘迪作音訓，孟頫在迪前，故取薛說。當南宋偏安，舉中原而棄之，淳化閣帖，購自榷場，定武蘭亭，輦歸金府，薛鄭諸人，徒於紙本想像，各以意爲之。何如潘迪之親見茲石爲審也。因準迪所次，改訂前後……<sup>22</sup>

此冊原來是依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之排序，乾隆認爲，至元五年（1339）潘迪作〈石鼓文音訓〉時，<sup>23</sup>趙孟頫已辭世，所以趙氏做此冊音釋時，採用薛說乃無可厚非。至於乾隆何以採納潘迪的排序，他認爲，據載十枚石鼓北宋時就在汴京（今河南開封），金代時又運至燕京，而南宋時薛尚功等人自然無法得見石鼓，僅憑榻本來想像，當然不及潘迪親見石鼓來得審慎可靠。薛尚功及〈元榻石鼓文〉冊之次序與潘迪〈石鼓文音訓〉對於石鼓順序之排比如附表一：

19 前引書，頁 560。

20 前引書，頁 560。

21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十，〈南有嘉魚之什·車攻〉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頁 648），詩文中有「車」、「攻」、「馬」、「同」四字。

22 〈重定元榻石鼓文識語〉，《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 561。

23 （元）潘迪，〈石鼓文音訓〉碑現仍存於北京，雙面刻楷書石鼓文音訓，碑陰有隸書潘迪題記。

石鼓名 作品名	吾車	沂毆	田車	鑿車	靈雨	乍原	而師	馬薦	吾水	吳人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及〈元榻石鼓文〉冊原次序	八	五	三	四	九	七	一	六	二	十
潘迪〈石鼓文音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乾清宮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基於上述原因，乾隆認為石鼓排序當以潘迪為準，重新排定〈元榻石鼓文〉冊的次第，由於此冊石鼓榻本有十一葉，連同其他識語跋文五葉，一共十六葉，因此乾隆採唐人韋應物〈石鼓歌〉中十六字：「喘息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sup>24</sup> 依次作為各葉排序之用，並書於葉首。

#### （四）考訂石鼓的影響

乾隆考訂石鼓所提出的論點，影響清代對於石鼓的看法。首先，乾隆採潘迪〈石鼓文音訓〉之排序後，石鼓排序在清代成為定論，如清王昶《金石萃編》中關於石鼓順序也是按潘迪〈石鼓文音訓〉，換言之是直接承襲乾隆的看法，未有更動。其他清代中後期的石鼓重刊或摹刻本，如《阮氏摹刻范氏天一閣本》、《盛昱重刻阮氏本》等，在次序上也與乾隆所定相同，並未因刊刻版本不同而有所更動。

其次，關於刻石年代。將石鼓視為周代刻石乃是自唐以來最為廣泛採用的說法，其中以石鼓為周宣王刻石的看法為最。但是以皇帝之尊，對石鼓具體提出說法並訂為周宣王之物，乾隆是第一人，因此在乾隆說法提出後，「其說乃定於一尊而無復異議」。<sup>25</sup> 乾隆末年以降，皆視石鼓為周宣王刻石，直到民國以後才由馬衡於〈石鼓為秦刻石考〉一文中提出異議，並訂石鼓為秦刻石。

最後，有關歷代榻本的校讎，本文在稍後論述乾隆五十五年重刻石鼓時，有〈汪由敦臨石鼓全文〉與〈王澐臨石鼓文〉兩冊進獻。值得注意的是，冊後參與重刻石鼓眾臣的識文（圖 4-1，4-2），可說是充分反應乾隆當時對歷代石鼓榻本的認識與了解。首先，汪由敦臨本有汪氏題云：「右石鼓全文六百卅六字」，冊後識文則指出「石

24 〈重定元榻石鼓文識語〉，《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 560。

25 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收錄於《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五，頁 166。



鼓之有全文，自明楊慎始」，是用心糾正明楊慎《金石古文》及《石鼓文音釋》中所謂「石鼓文全本」<sup>26</sup>之謬誤，指出早在唐人記載中石鼓就已多有缺訛；何以再數百年後有所謂全本之說？其中共列舉八項楊慎的謬誤，是對石鼓版本的另一面向考證，也直接駁斥自明以來所謂石鼓全本說。

至於在〈王澍臨石鼓文〉冊後識文說明，雖然不知王澍臨自何本，但此冊臨本有四百六十八字，「所臨較周越胡世將爲少，視諸家則已多，或當時猶見宋舊本。」則是依王澍臨本之字數推斷，即使比起宋代某些記錄中字數較少，卻比上所列舉諸家錄載石鼓字數來得多，顯然是參照宋代舊榻臨寫。同時也說明，所列舉包括歐陽修《集古錄》等歷代關於石鼓著錄，即使在音釋上見解不同，無論參考的是石本或榻本，絕不會有楊慎所偽造石鼓全文之誤。前述在石鼓次序排定上，儘管乾隆捨宋薛尚功而採元潘迪之說，但在此則對薛尚功篆法多所肯定，因此總結歷來討論石鼓的看法，則有「鹵莽者多從楊，矜重者多從薛」的結論。透過這些考訂，解決歷代石鼓爭論，姑且不論正確與否，仍可以看出乾隆在考證上的用心，正所謂「辨析豪芒，考訂同異，不泥古而崇實」。

### 三、重刻石鼓

由上述可知，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對於石鼓的刻石年代、排序等歷來多所爭論有了自己的定見。又據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可知，乾隆皇帝有感於所見石鼓文拓本上的文字因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原有字數的一半，更鑑於石鼓爲三代所遺之千古重器，再加上自元以來就置於國子監爲「萬世讀書者之津逮」的重要象徵意義，身爲一國之君自然肩負保存重要文化遺產的使命，這是乾隆皇帝欲重刻石鼓的首要原因。

其次，時至乾隆五十五年，大清國勢臻於顛峰狀態，宇內晏安，尤其在對外武功上，完成了「十全」大業中的八項功業；<sup>27</sup>乾隆在對外「武功」達於極盛的時候，不

26 楊慎在《石鼓文音釋》中說明石鼓全本有 657 字，《金石古文》則記有 702 字。（明）楊慎《石鼓文音釋》，頁 326-352。（明）楊慎《金石古文》，卷二，頁 781-782。

27 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平廓爾喀部，清兵凱旋之際，乾隆帝回憶即位後所建立的對外十大武功，因作《十全記》以紀其事；如依時間順序排列，乾隆的「十全武功」應該分別是：1.乾隆十二年（1747），平大、小金川；2.二十年（1755），平準噶爾部；3.二十二年（1757），再平準噶爾部；4.二十四年（1759），平回部；5.三十四年（1769），平緬甸；6.四十一年（1776）

免想要在「文治」方面建立功勳，且中國古代凡被稱為「盛世」的必要條件之一，必須是文治、武功均達於極盛的狀態，故乾隆皇帝如果想要被後世譽為「聖君」，顯然需要在文治上多所建樹；這可以解釋為何乾隆晚年先後修成了《四庫全書》、滿文翻譯《全藏經》的因素。

復次，想要在文治方面有所表現，其實光是修成了《四庫全書》、滿文翻譯《全藏經》等大型古籍顯然是有所不足地；而自清初積極推動漢化政策以來，乾隆深知，要鞏固自我的歷史地位，除了獎崇文化事業之外，更須積極宏揚儒學始克成功，因為「儒家思想」始終居於傳統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主流價值地位——重製「石鼓文」，顯然與宏揚儒學有著密切地關係。最後，「石鼓文」又稱「獵碣」，在乾隆認知中是記載周宣王畋獵的史實，與滿洲人的民俗傳統重視田獵，亦有著密切關係；且乾隆所重製之石鼓文，指定將其中一套置於熱河避暑山莊，因「熱河文廟為歲歲惠遠詰武之地」，即此地正是清廷皇室經常狩獵行圍之地，似亦含有飲水思源不忘本的用意之內。

除上述動機之下，更以先前的考訂為基礎，包括確定石鼓所存字數，以石鼓為周宣王時物，在次序及音訓以元潘迪為準等論點，同時改正明楊慎所謂石鼓全文之誤，因此在〈重排石鼓詩〉中有「楊家偽作概從芟」，<sup>28</sup>是以在〈重刻石鼓序〉後衆臣跋文中亦有「明楊慎乃造為七百二字全文，其集復云六百五十七字，以矛攻盾，作偽無疑」。基於糾謬改誤的原則，乾隆御令集石鼓文尚存的三百一十字，重排石鼓詩十首，其中乾隆親自完成首、末兩首，第二至第九首則命彭元瑞按剩餘字排句成章，又命人重刻石鼓十枚，「以滇中白石為之，文鐫鼓面」，<sup>29</sup>與舊石鼓尺寸大致相同，鼓面上以石鼓文摹刻重排石鼓詩一首，共刻成二套，一套置於北京孔廟大成門外兩側（圖 5-1、5-2），與周石鼓分列大成門內外，另一套則放置熱河文廟（圖 6）（現存於避暑山莊博物館）。又將大成門內舊石鼓所在設屋簷置柵欄以蔽風雨。乾隆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寫成〈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並將此序摹勒上石，與〈重排石鼓文音訓〉同刻於一碑（圖 7），與新刻石鼓並列立於大成門外東楹。不僅如此，更

---

再平大、小金川；7.五十三年（1788），平臺灣；8.五十四年（1789），平安南；9.五十六年（1791），平廓爾喀部；10.五十七年（1792），再平廓爾喀部，詳參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一書。故知，在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間，乾隆的對外武功，已完成了八大功績。

28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頁 1455。

29 （清）徐珂，〈鑑賞類·高宗仿製石鼓〉，《清稗類鈔》，頁 4367。

於西楹立碑，碑額刻有乾隆御筆「瓊辭神筆」及〈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御製詩（圖 8），碑體四面刻內府所收〈張照草書書韓愈石鼓歌〉（圖 9）。

## 四、聖主明君的形塑

何以乾隆選擇在八十大壽這一年重刻石鼓？除了上述動機外，是否背後有更深刻意含？眾所周知，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不但是國史上在位時間名列前茅的帝王之一，並曾締造出後世所艷稱的「乾隆盛世」。因而，在乾隆五十五年，也正是他八十大壽那年，當成就八次對外「武功」後，乾隆選擇存世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刻石——「石鼓」，加以考訂並重刻，用來證明其「右文重道」，更進一步塑造自己為「文成武德」之聖君。石鼓的重刻，無疑是乾隆形塑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以下分述之。

### （一）重刻石鼓在時間氣氛的營造與跨越時空的對話

將乾隆從事與重刻石鼓相關事件做一時間上排序，如附表二：

時間	事件
乾隆十四年	擱石鼓置於乾清宮。
乾隆四十八年	得元榻石鼓文。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	考訂石鼓刻石年代及次序。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	重題元榻石鼓冊並改其次序。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重裝元榻石鼓冊，裱入乾隆御筆題識。 <sup>30</sup>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	命趙秉沖辦理石鼓篆文。 <sup>31</sup>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	懋勤殿交〈王澍臨石鼓文〉冊、〈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冊。 <sup>32</sup>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五日	寫成〈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再題石鼓。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中旬	題〈重排石鼓詩〉。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	題〈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 <sup>33</sup>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六日	二月下旨裝裱〈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一卷，五月裱成。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閱視新鑄石鼓於戟門。 <sup>34</sup>

30 〈如意館〉，《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1 〈趙秉沖列傳〉，《清國史館傳稿》，1286 號。

32 〈行文〉，《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33 〈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御製詩集》五集，頁 474。

34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三五五，頁 147-1。

藉由上表的時間排序，可以發現自乾隆五十四年八月考訂石鼓年代與次序後到隔年五月，乾隆似乎陷入了「石鼓熱潮」。其中在八月將歷代石鼓最有爭議的三個問題——刻石年代、排序及所存字數定調後，便進而著手重刻石鼓，先利用石鼓尚存的三百一十字來從重排十章石鼓文，進而爲之寫序，最後則具體重刻石鼓並立碑。當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八十歲的乾隆提筆寫下〈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其中內容就包括十章重排的石鼓詩，前已提及，這些石鼓詩首末兩首爲乾隆所作，剩下八首是交由彭元瑞等人完成，可見重排石鼓詩必定完成於寫序之前，是乾隆特別挑在他八十歲生日那年的春正月才將它公諸於世。此外，又據〈趙秉冲列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即命趙秉冲辦理石鼓篆文，再加上表的時間排序，於此益可證乾隆皇帝早已在他八十壽辰的前一年就選定石鼓並開始策劃重刻石鼓事宜，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壽辰時才具體將石鼓定調並重刻之。

不僅如此，由《御製詩集》收錄寫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可知，乾隆重刻石鼓的同時，也爲大學士和珅所進獻的〈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題詩。<sup>35</sup>其中有「昨近攷訂石鼓文。石鼓文紛不脛走」等句，說明重訂石鼓文用以述古傳今，經由皇帝登高一呼，因此陸續有〈王澍臨石鼓文〉（圖 10）與〈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圖 11）兩冊進獻；<sup>36</sup>無疑地，皆是由下而上呼應乾隆重刻石鼓之舉。

除了時間氣氛的刻意營造，再加上考訂、刻石、立碑等具體作爲外，乾隆皇帝有意選擇中唐大儒韓愈爲跨越時空的對話對象，並進一步回應韓愈的看法。首先，就刻石年代雖沿襲乾隆五十四年時所認定爲周宣王時所刻，但在乾隆五十五年作〈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時，總結刻石年代時，明白以「總不若韓愈之見爲正」來定調石鼓爲周宣王鼓。此外，題〈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中「豈我獨是韓之說」，是乾隆以張照書韓愈石鼓歌來證明，張照也服膺韓愈之說，認定石鼓爲周宣王時所刻。

值得注意的是，韓愈的〈石鼓歌〉有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說明了西周到了宣王統治前夕，王道已然墮陵

35 〈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御製詩集》五集，頁474。

36 〈如意館〉，《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活計檔》記此兩冊於此年正月初十日進呈如意館，現皆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不振，以致於四海沸騰；幸而宣王曾經四處用兵，重振國威。據史文記載，宣王曾北伐玁狁，<sup>37</sup>東征淮夷、徐夷；<sup>38</sup>南討荆蠻與南國；<sup>39</sup>西征戎、太原之戎、條戎、奔戎、申戎及姜氏之戎等等。<sup>40</sup>於此可知，周宣王的對外用兵，包含了東征（淮夷、徐夷）、西討（西戎、太原之戎、條戎、奔戎、申戎及姜戎）、南征（荆蠻、南國）及北伐（玁狁），其中除了敗師於條戎、奔戎、姜戎及南國之師以外，<sup>41</sup>其他戰役均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勝利。而周宣王在對外重振國威後，又大開明堂，接受四方諸侯的朝賀，後世因而稱頌周宣王為西周的「中興英主」。

至於乾隆皇帝，雖然上承康熙、雍正盛世，但大清帝國的對外開拓，實際上泰半是在乾隆在位期間所完成；如前所述，乾隆在重製石鼓文的前夕（即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間），在對外征戰的紀錄上，完成了「十全武功」中的八大功業——日後的兩度平服廓爾喀，更可謂錦上添花，讓乾隆得以自詡其「十全武功」。也就在乾隆五十五年以前，乾隆皇帝在文治上也陸續修成了《四庫全書》、又以滿文翻譯了《全藏經》等大型古籍，如果能夠再加上重製所謂周宣王時代的重要刻石「石鼓」，就可以再增添一筆宏揚儒學的功蹟，則乾隆自認為也足以被後世視為「中興英主」了。

又據〈再題石鼓詩〉云：

石鼓韓歌掘臼科。弗知其意所云何。茲因考古十之質。爰命圖真一有窠。  
慨嘆曾充春杵用。傷形閱歲歲年多。言行國學歷珍棄。重道崇文功不磨。<sup>42</sup>

此詩針對韓愈〈石鼓歌〉「為我量度掘臼科」一句，由於乾隆根據命人所拓石鼓搨本，其中一鼓被鑿為臼形，而明白韓昌黎〈石鼓歌〉所言為何。其次，韓愈於〈石

37 玁狁即日後秦、漢時代主要外患的匈奴人；周宣王用兵玁狁的記載，見於前引《毛詩正義》，卷十，〈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月〉，頁 631-641。

38 見前引《毛詩正義》，卷十八，〈大雅·蕩之什·江漢〉，頁 1240-1248；同卷，〈大雅·蕩之什·常武〉，頁 1249-1256。

39 周宣王命方叔討南蠻，見於《毛詩正義》，卷十，〈小雅·南有嘉魚之什·采芑〉，頁 641-646；又命召伯虎討南國，見《毛詩正義》，卷十八，〈大雅·蕩之什·崧高〉，頁 1206-1218。

40 周宣王對於西戎的用兵，見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載，宣王命秦襄〔莊〕公付戎，宣王親征太原之戎、條戎、奔戎與申戎（頁 2871-2872）。又，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曾記載周宣王伐姜氏之戎一事，頁 144。

41 按，周宣王的用兵西戎，似乎遭受到不少挫折，其敗師於條戎、奔戎，見前引《後漢書》卷八十七〈西戎傳〉，頁 2871-2872；而前引《史記》，卷四，〈周本紀〉亦載：「（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頁 144；《史記·周本紀》又載：「宣王既亡南國之師」，頁 145，可見周宣王用兵南國，同樣遭受挫敗。

42 〈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御製詩集》五集，頁 474。

鼓歌〉中就表明應將石鼓置於「太學」的看法，乾隆認為舊石鼓置於「國學」，無疑是「自以昌黎之見為正」的一種做法。更因為「昌黎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予較昌黎為勝矣」，<sup>43</sup>在回應韓愈看法的同時，更以皇帝的身份採取更積極的作法除了搨舊石鼓外，又重定石鼓文並製鼓重刻。

早在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就曾下詔敕封韓愈三十世孫韓法祖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並由其後代子孫世襲其位。<sup>44</sup>雖然，早在清軍入關以前，為了積極推動漢化，自順治元年（1644）起即敕封復聖顏子、宗聖曾子、亞聖孟子之後代子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sup>45</sup>而在入關之後，康熙、雍正正在位期間，更是屢屢加封儒家的先賢為世襲五經博士；<sup>46</sup>然而，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一共只封了三位世襲其位的五經博士，第一位就是韓愈的三十世孫。<sup>47</sup>可見，乾隆皇帝早在登基之初，對於韓愈的特別厚愛，可謂其來有自矣。

## （二）「道統」的權威代表

研究指出，康熙皇帝努力在文化與思想領域有所作為，為得是使皇權成為「政治」與「文化」的運作核心，政治權威與文化權威可以合而為一，<sup>48</sup>清初三位皇帝在位居「治統」之最高領導者的當下，用盡一切手腕、方法，來塑造自己成為「道統」的繼承者，藉此攏絡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無非是想達到《禮記·中庸》所謂：

43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御製文集》三集，頁631。

44 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敕授先儒韓子愈三十世孫法祖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45 順治元年（1644），順治皇帝曾敕封孔子六十五世孫允鉅，奉子思廟祀（北宗）；同年，又封復聖顏子淵六十八世孫紹緒、宗聖曾子與六十四世孫文達、亞聖孟子與六十三世孫貞仁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十二年（1655），又授先儒朱子熹徽派十五世孫煌，奉婺源廟祀。

46 康熙皇帝除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授孔子六十六世孫興醜主衢州廟祀（南宗）以外，並曾敕封元聖周公七十三世孫東野沛然、授先儒張子載二十八世孫守先主鳳翔廟祀、授闕派十八世孫朱滌，主建安廟祀、授先賢閔子騫六十五世孫衍籛、授先賢端木子貢七十世孫謙、授先儒邵子雍三十世孫延祀、授先賢言子游七十三世孫德堅、關羽五十七世孫壽主洛陽廟祀、先賢卜子夏六十四世孫尊賢；皆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雍正皇帝曾敕封先賢冉子伯牛六十五世孫士朴、先賢冉子仲弓六十七世孫天琳、先賢顓孫子張六十六世孫誠道（道光四年改歸嫡長樹勳）、關羽五十二世孫居斌奉解州廟祀、關羽五十二世孫朝泰主當陽廟祀；皆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嘉慶皇帝則於嘉慶十年（1805），授先儒伏子勝六十五世孫敬祖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47 除韓愈之外，乾隆皇帝又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敕封授周公七十七世孫肇勳為五經博士，並主咸陽廟祀；乾隆五十三年（1788），再封先賢有子若七十二世孫守業為五經博士，然此人受封的時間，都比韓愈三十世孫受去的時間晚了許多年。

48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88-124。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sup>49</sup>

結合「治統」與「道統」，成爲「既有其德，又有其位」的一代「聖主明君」，是其終極目標。也由於「孔廟本爲『道統』的具體象徵……清初三位君主皆善於利用孔廟禮儀來表達『政教合一』的政治手腕」，<sup>50</sup>因此，乾隆選擇孔廟中儒家經典刻石的象徵——「石鼓」，加以考定重刻，無疑是繼承康熙的政治理念，爲了顯示身爲皇帝在道統文化上有絕對權威。

至於積極回應韓愈，其目的是承繼所謂的「道統說」，韓愈曾云：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sup>51</sup>

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的道統，此說的創立者韓愈，更是以上承道統爲己任。之後，韓愈更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完成了復興古文、重振儒學之重要的貢獻；因此，不但被宋儒稱頌爲「唐宋八大家」之首，亦被視爲宋代理學（新儒學、性理學）之祖；日後，由南宋朱熹所完成的「道統說」，更是直接以韓愈上承孔、孟。乾隆皇帝自詡爲中國傳統「道統」的繼承者，當仁不讓地想要上承韓愈。

事實上，除了「重刻石鼓」，同年乾隆也考證《詩經·邶風》中有關「涇清渭濁」一事。據《石渠寶笈續編》，有〈御筆涇清渭濁紀實〉一卷，寫於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乾隆自述原委：

近因詩中用邶風涇以渭濁事。玩以字義。自當作涇水為渭水所濁解。乃朱注則以為渭清涇濁。心疑其誤。而泥其說者不免耳食。因命秦承恩親履二

4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五十三，〈中庸第三十一〉，頁1457。

50 同註48，頁117。

51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頁7-11。

水由甘入陝之源。究其實在情形。茲據覆奏。辨析甚明。果為涇清渭濁。既詳著紀實文。并附錄承恩原摺。因再成是什。以誌攷古訂譌之意。<sup>52</sup>

由上可知，乾隆因讀《詩經》〈邶風谷風〉篇有「涇以渭濁」一詞，以詩義觀之是「涇清渭濁」，東漢鄭玄箋注時認為是「涇清渭濁」，但自唐陸德明、孔穎達等人開始則注疏成「涇濁渭清」，南宋朱熹集注時也以「涇濁渭清」，乾隆於是命陝西巡撫秦承恩赴涇渭兩河合流處進行實地考察，確認實為「涇清渭濁」，因此乾隆寫下〈涇清渭濁紀實〉說明此事原委並裱裝成卷。<sup>53</sup>此事與重刻石鼓有異曲同工之處，性質上，同樣是考証唐宋以來儒學經典詮釋的爭議，但對於乾隆而言，改正南宋朱熹集注的錯誤，或許更可以突顯自己在道統繼承上的權威性。

可以看到，接下來的幾年，乾隆似乎醉心於樹立文化道統的權威。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諭令內閣校勘蔣衡所書十三經後於辟雍刻石立碑，「以為千秋萬世崇文重道之規」，五十七年寫〈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圖 12），同年二月將此序文立碑，其中提及：

石鼓不過周宣王之事，列於文廟之門，以寓興文，尚俟時其會；若夫《十三經》，則古聖先賢出諸口以傳道授教，其重於〈石鼓文〉奚啻倍蓰哉！<sup>54</sup>

一方面說明《十三經》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看出重刻石鼓是一連串樹立文化道統行動的序曲。此外，序文中也點明，儘管漢唐宋元明歷代皆有刻石經之舉，但遠比不上此次詳盡，可見刊刻石經是大一統朝代的文治象徵，乾隆自然不能忽略。三年後，乾隆五十九年（1794）九月，浩大的石經刊刻工程竣工，藉由刊刻石經，乾隆接續漢唐宋元以來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再次宣示道統上的繼承。

最後，於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選擇在國子監立〈乾隆御製說經之文〉碑（圖 13）共十三石，對於這些文章，乾隆曾簡述其要旨：

朕臨御以來。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幾餘典學。於詩書六藝之文。偶有闡發。俱與政治相關。即義疏相承。舛訛未正者。為之折衷定論。亦有裨於

52 〈御筆涇清渭濁紀實〉，《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頁 1457。

53 據《石渠寶笈續編》此卷分成四部份，引首題「探源訂誤」，本幅為御筆〈涇清渭濁紀實〉，後幅為〈西安巡撫秦承恩覆奏涇清渭濁實據詩以誌事一韻二首〉御製詩，後有董誥畫涇二水由合流至黃河一圖，最後附錄秦承恩覆奏原摺的全文。同上註，頁 1457-1460。

54 〈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御製文集》三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卷九，頁 7。



世道人心。凡平日出治之要。皆可與說經之言相印證。蓋發為文章者。胥應見諸政事。<sup>55</sup>

這一百四十篇彙集乾隆對於《十三經》所做相關考證、改誤或有感而發的文章共其中就包含前述〈涇清渭濁紀實〉一文，這些與《十三經》相關文章的彙集，除了表彰經學外，清楚宣示乾隆在儒學經典上的詮釋權，更再次肯定他在文化道統上的絕對權力，毫無疑問，乾隆不僅是治統上至高的權力象徵，又同為文化道統的權威代表。

### （三）在位最後五年的文治武功

除了樹立道統權威。若把時間軸線拉長，並換個角度，可以說明乾隆重刻石鼓等作為的其他動機與目的。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頒布諭旨：

昔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八十有五，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sup>56</sup>

乾隆表明自己在位的時間將不超過康熙的六十一年，換言之，將在乾隆六十年時歸政並傳位于皇太子。隨著時間推移，對於這項重大的宣示，乾隆念茲在茲，因此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時，下令鑄刻「八徵耄念之寶」，並云：

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sup>57</sup>

可以看出，年屆八十的乾隆，開始倒數即將歸政之日，對於在位所剩的六年是如何兢兢業業。

在時間壓力下，為了在歸政時達到「文成武德」之目標，乾隆開始一連串的行動，也因此乾隆五十五年當他年滿八十時，先是重刻石鼓，在重刻石鼓序首句即云：「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天貺，以成其功。」回首六十八歲宣示將於八十五歲歸政一事，如今已年屆八十，似乎對於天命更有感受，認為能否成就大

55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四四二，頁 258-1。

56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〇八一，頁 532-533。

57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三四五，頁 1235-1。

事是關乎時運。可以看出歸政的倒數時刻，對想要有更多功績的乾隆而言是一種壓力，因此在重刻石鼓後，隔年（五十六年）十一月便宣布刻十三經，五十七年寫〈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並立碑刻石，重申「八十老人復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賴昊天之鴻貺乎！」這似乎是八十歲以後乾隆的一貫態度，一方面積極地再執政倒數的時刻中，盡可能完成文治武功上的成就，一方又將所有功業的成功歸功於天佑。

同年，當再平廓爾喀部時，成就所謂「十全武功」，乾隆記述十全功績，於是寫下〈十全記〉末云：

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復何言。<sup>58</sup>

可見，越接近歸政的時刻，乾隆越感受到天命難測，也越急切想要成為「文成武德」的典範，在乾隆五十七年當完成了「十全武功」可說是成就了「武德」。

又如「十三經刻石」，一百九十座碑共刻六十三萬字，如此繁浩的工程，也僅費時三年，並於乾隆五十九年竣工。其中最末碑刻〈告成表文〉，列舉乾隆文治上主要功績：

收善本而入琳瑯，寶森福地。採遺書而登緗縞，瀾匯文淵。堂顏萃室之名，相臺美合。殿刻金經之版，官槧精讐。泮鎬建於橋門，一規園轉。參籀文於獵碣，石鼓重排。<sup>59</sup>

包括重刻石鼓在內，這些文治上的成就，在乾隆五十九年時十三經刻石竣工時可說是劃下完美的句點，成就了「文成」的部份，不過乾隆仍刻意選擇在乾隆六十年二月，在孔廟釋奠禮成後，才親臨辟雍閱覽新刻石經，並宣告石經落成。同年也立〈乾隆御製說經之文〉碑，又為乾隆文治功績再添一筆。

最後再刻〈御製丁祭釋奠詩〉碑，詩云：

踐昨年當天數慶。八旬五豈易為望。幸蒙昊貺符心願。感謝師承叩已蒙。莅政臨民惕宵旰。志于心欲仰宮牆。石經覈準全刊壁。三一參差勝漢唐。<sup>60</sup>

58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四一四，頁1019-1。

59 (清)文慶、李宗昉等纂，〈金石志七·御定石經碑〉，《欽定國子監志·下冊》，卷五十九，頁1038。

60 〈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卷一四七〇，頁632-1。

除了宣告石經竣工外，說明十三經刻石之規模是超越漢唐兩代，乾隆志得意滿之餘，仍提及年滿八十五歲歸政一事，又再次強調以民為念的天子職責。

綜上述，自乾隆年滿八十歲開始，進入歸政的倒數階段，因此乾隆更積極在文治上有所建樹，先選定極具代表性的石鼓重刻，此後的幾年中，也都針對這些儒家經典有立碑刻石的動作，同時不斷在文字中強調歸政在即的同時，他是如何兢兢業業地想要成爲一個「文成武德」同時又「典學勤政」的聖主明君，透過一連串與文化經典相關活動，如重刻石鼓與十三經刻石，提醒世人，武功上他是十全老人，文化上的建樹也不遑多讓。

## 五、文物的再詮釋

乾隆重刻石鼓，不僅是用以形塑其聖主明君形象的憑藉，事實上，因為重製石鼓而產出跨材質的各類文物，更提供乾隆時期仿古及各類文物製作的重要範例，以下分梳之：

### （一）「以古為本」——重製石鼓

觀看舊石鼓，不難發現與「鼓」的外形並不十分相似，且每鼓尺寸大小不一，但沿襲唐代以來的舊說仍以「石鼓」名之，因此在乾隆重刻之際，決定將石鼓以具體的形象呈現，重新製作尺寸與舊石鼓相似的新石鼓，取雲南地區所產的白色大理石刻成「大鼓」形狀，每鼓大小相同，不同於舊石鼓將文字刻於鼓腰，新石鼓是將文字刻於鼓面，每鼓以天干排序（圖 14）。

值得注意的是，重製石鼓乃「以古為本」。首先，在文字上是採用舊石鼓文所存三百一十字重編石鼓詩十篇，並以同樣篆法書之；形體上，則依唐代以來的稱謂——「石鼓」加以具體化，因此賦予「鼓」的造型，因此「以古為本」並予以重新詮釋的石鼓，就在乾隆五十五年製成，據《清高宗實錄》：「（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丙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閱視新鑄石鼓於戟門」，可見兩套新刻石鼓至少在乾隆五十五年五月時已完成。

至於新刻石鼓上所摹刻之石鼓文是何人所書？查《石渠寶笈續編》其中著錄有〈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一卷，本幅內容正是乾隆御筆〈集石鼓所有文成

十章製鼓重刻序》，後幅則有「重摹御定石鼓文篆書。款。臣趙秉沖奉敕敬篆」，<sup>61</sup>又據清國史館傳稿 1286 號〈趙秉沖列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上以趙秉沖辦理石鼓篆文」，列傳中記錄，此人因書畫優異表現，早於乾隆四十四年以國子監生為懋勤殿行走，並奉旨繕寫篆字，而現存北京孔廟大成門外東側的〈重排石鼓文音訓〉碑，碑末有參與此次重刻石鼓相關人等的題名，其中負責「摹篆」的是「懋勤殿行走戶部員外郎趙秉沖」(圖 15)，說明重刻石鼓上之石鼓篆文為趙秉沖所書。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趙秉沖篆書〈白行簡五色露賦句〉(圖 16)，書風承繼唐李陽冰的鐵線篆，正與重刻石鼓上的篆書筆法相似，可以看出趙秉沖篆書圓熟工整。

## (二) 各類與重刻石鼓相關文物

乾隆除了重製石鼓，更將乾隆五十五年所寫與石鼓相關序文及御製詩等墨蹟裱裝成卷，據《活計檔》載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六將這些墨蹟送裱，五月二十六裱裝成〈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一卷，《石渠寶笈續編》此卷內容依序：引首是御筆「文存石壽」四字，本幅有二，分別是〈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與〈再題石鼓〉，後隔水是御筆〈重排石鼓詩得句〉，後幅有趙秉沖篆書〈御定石鼓文〉與其他眾臣所製識文，藏於重華宮。<sup>62</sup>按《活計檔》此卷的裝裱極為講究：

旨發往蘇州交徵瑞照發去紙樣分位裱做手卷一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裱、髹，做雕龍匣，其前引首大字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欵此。<sup>63</sup>

此卷包首、包伏、玉髹及匣子，都具體呈現乾隆時期精緻工藝，其中雕龍匣(圖 17)，<sup>64</sup>此盒紫檀質地，製作精細，雕刻工整，與故宮博物院藏〈趙幹江行初雪〉的木匣(圖 18)極為相似。乾隆常書寫此類考訂、紀實或述史並裝裱成卷，這類紀實性質的書法長卷更是乾隆朝的特有產物，包括〈御筆八征耄念之寶記〉、〈御筆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御筆十全記〉等，多見於《石渠寶笈續編》，與重刻石鼓相似，都是乾隆主政末期重要功業的紀實。

61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頁 1455。

62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頁 1452-1457。

63 〈行文〉，《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六)。

64 2008 年 5 月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賣出〈清乾隆 紫檀嵌螺鈿石鼓文畫盒〉，正是用來裝〈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卷的外盒，參見網址 <http://www.polypm.com.cn/pmwp.php?ppcd=art53102028>。

這些長卷，更以刺繡方式複製，如本文所論及之〈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此件「爲大內以絹爲底，朱筆雙鉤御筆石鼓文章序，以刺繡而成」（圖 19），<sup>65</sup>現今〈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卷無從得見，然觀看此圖，可以想見墨蹟卷的樣貌，其中引首乾隆御筆「文存石壽」四大字，據前引《活計檔》墨蹟本在裝裱時就要求：「其前引首大字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sup>66</sup>今刺繡本引首正有此花邊。這類以將書法用織繡形式複製，也常見於乾隆時期，現今仍可以見到如上述〈縹絲姜晟書高宗純皇帝御筆八征耄念之寶記〉、〈御筆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及〈御筆十全記〉，皆是乾隆御筆書裝裱成卷再加以複製。同樣寫於乾隆五十五年的〈涇清渭濁紀實〉，是乾隆考證《詩經·邶風》有關「涇清渭濁」一事的記錄，裱成〈御筆涇清渭濁紀實〉一卷，<sup>67</sup>再以刺繡複製（圖 20），與上述這些紀實長卷如出一轍。

此後，更將序文被摹勒上石刻製成碑，刻於碑陽，碑陰則刻〈重排石鼓文音訓〉，此乃援引元潘迪〈石鼓音訓碑〉的體例，音訓全文後則刻有王杰等衆臣識文，除了刻〈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立於大成門外東側，另西側的相對位置則是〈御題張照書韓愈石鼓歌〉碑，所刻爲和珅進獻〈張照書韓愈石鼓歌〉草書卷，乾隆曾御筆題引首「瓊辭神筆」四字，並於卷後題〈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sup>68</sup>此碑四面環刻前述內府所收〈張照書韓愈石鼓歌〉草書卷之文字，碑額則刻原於卷上引首之御筆「瓊辭神筆」四字及〈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又據《活計檔》曾記，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五，乾隆分別賞賜兩廣總督福康安及安南國王阮光平〈御製集石鼓詩序〉墨刻一卷，<sup>69</sup>應是拓〈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裝裱成墨刻本，將墨拓本裱裝成卷是乾隆重刻石鼓後隨之衍生出的文物。

按《欽定國子監志》：「第六鼓石面恭刻高宗純皇帝〈御製再題石鼓詩跋〉」，<sup>70</sup>由於第六鼓至少在唐代就已經被鑿成石臼，因此乾隆命人將第六鼓的石面刻上所謂〈高

65 2001 年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曾拍出一卷〈刺繡御筆石鼓十章序〉，內容正是〈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相關資料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guardian.com/pic.php?sessioncode=&specialcode=PZ0000237&picid=art15880117>。

66 〈行文〉，《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67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頁 1457-1460。

68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 691。

69 〈記事錄〉，《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70 〈清〉文慶、李宗昉等纂，〈廟志一·廟制圖說〉，《欽定國子監志·上冊》，卷一，頁 38。

宗純皇帝御製再題石鼓詩跋》(即〈再題石鼓〉)，<sup>71</sup>依《國子監志》之案語：

御書凡五十一行，每行字數以石面之廣狹為差。左旋右轉，至末二行，書乾隆庚戌春御題。鈐寶二，曰「乾隆」，曰「八徵耄念」。<sup>72</sup>

可知是把再題石鼓詩跋共二百二十一字，據石面寬窄得以容納之字數，依逆時針方向，分成五十一行刻之(圖 21)。這種將御筆詩文刻於古器物的方式，常見於乾隆朝，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漢玉璧插〉(圖 22)，將古玉璧壁面摹刻上御筆御製詩，另一面則摹刻三方乾隆印，再把玉璧鑲嵌於紫檀製的木插屏。

又據《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十有〈汪由敦臨石鼓文〉冊及〈王澐臨石鼓文〉冊之進呈，更為乾隆重刻石鼓之舉錦上添花，其中汪由敦所臨石鼓寫於康熙六十年(1721)，王澐石鼓冊寫於雍正八年(1730)，皆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其上石鼓文書法都屬於鐵線篆，筆劃粗細一致，是清初時的典型篆書。然而，在兩冊進呈後則由王杰等人於冊後識文，識文中皆提及「御製重排石鼓文」，可見內容正與乾隆重刻石鼓相關，事實上是充分反應乾隆對石鼓的看法。首先關於汪由敦臨本，汪氏於跋文中說明「右石鼓全文六百卅六字」，是以乾隆諸臣於冊後識文對於明楊慎偽作石鼓全本的謬誤加以一一駁斥，識文最後說明：

(汪)由敦所書雖亦沿慎而眷舊至意，仍藏壁府且命臣等詳採舊說，識後用彰聖人崇真求是之。<sup>73</sup>

同樣的觀點立場，也出現在王澐臨石鼓冊的冊後識文，識文以為：王澐此冊共臨四百六十八字，與唐宋以來諸家字數相去不遠，較元、明兩代字數為多，儘管諸家看法有所出入，但並非如楊慎所偽造有七百二字全文，且篆法與宋薛尚功本相似，是以總結歷來討論石鼓的看法「鹵莽者多從楊，矜重者多從薛」，若以書法來看，比較這兩冊石鼓文不難發現，王澐的篆書比汪由敦來得純熟，筆體結構嚴謹，筆畫清勁，於是在冊後識文強調「澐精於篆書」，更由於王澐是清初以篆書知名的重要書家，

71 據乾隆〈再題石鼓詩跋〉描述：「第十鼓平面，則鑿為大孔」。然而根據前述乾隆重定石鼓次序，被鑿為石白是第六鼓，是以不知何故乾隆記為第十鼓，特此說明。

72 (清)文慶、李宗昉等纂，〈金石志九·周石鼓〉，《欽定國子監志·下冊》，卷六十一，頁1092。

73 關於汪由敦臨石鼓冊，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名為〈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冊後識文參見〈汪由敦臨石鼓全文〉，《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698-699。

<sup>74</sup>故認定此本與〈元榻石鼓冊〉「皆足供採擇」的重要版本。<sup>75</sup>

再觀新刻石鼓上的篆書，筆畫粗細一致屬鐵線篆，是清初篆書的典型風格，前段曾言〈王澍臨石鼓文〉冊與〈元榻石鼓冊〉皆適合作為參考的依據，然在今日清宮舊藏元榻本已不得見的情況下，將新刻石鼓的篆書與王澍臨本比對，可以看到新刻石鼓的結字、篆法皆與王澍書風相近，正如冊後識文乾隆肯定王澍在篆書上的成就，是以重刻石鼓時，在一定程度上參考王澍的篆書。

### （三）「以古創新」——石鼓相關的文房珍玩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一組〈石鼓硯〉（圖 23），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石鼓式端硯十方，各帶金漆盒一個，分陳二硬木匣，內底分天干字數」。<sup>76</sup>是以端石刻大面圓鼓造型，鼓身上下緣皆雕有鼓釘紋飾，硯面沿邊起細綾為硯堂，硯堂上方凹下為偃月形墨池，硯直徑約 11 公分，每方硯底部皆刻有「石鼓文」，文字上方分別有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編號，一套共十件，整套石鼓端硯皆配有鼓型金漆盒，與石鼓端硯形制相同，盒內髹黑漆，鼓身上有泥金繪纏枝番蓮花，鼓面（即盒蓋）上則是泥金繪萬字底紋，其上以黑漆書寫與硯底相同之石鼓文。將乾隆新刻石鼓與臺北故宮所藏石鼓硯及硯盒相較，除尺寸與材質不同外，可確定石鼓硯及硯盒所刻正是乾隆御令重排石鼓歌，是以重刻石鼓為本，加以創新而來的文房珍玩。

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組〈端石倣古石鼓文硯〉（圖 24），同樣是十方硯一套，每方硯直徑 11 公分，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石鼓硯〉尺寸相同，唯於形制上略有不同，此組為有蓋硯，硯堂及墨池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石鼓硯〉相類，闔上硯蓋則為完整扁平之石鼓形，硯蓋上同樣鐫刻重排石鼓詩，也有天干編號，與重刻石鼓及〈石鼓硯〉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故宮這組石鼓文硯硯底刻有楷書識文，與乾隆御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中所寫識文相同。

又據清汪近聖《鑑古齋墨藪》卷二〈乾隆朝貢墨〉中有一套〈御製重排石鼓文墨〉

74 劉恒著，《中國書法史·清代卷》，頁 80-81。

75 〈王澍臨石鼓文〉，《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頁 609-610。

76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4 冊，頁 307。

(圖 25)，<sup>77</sup>形制與北京故宮所藏〈石鼓文硯〉同樣，正面刻石鼓詩，背面則為楷書識文，與汪氏著錄相同石鼓墨一套現為私人所有(圖 26)，<sup>78</sup>一套十錠，每錠墨直徑 5.2 公分，全套以黑漆盒盛裝，盒上螺鈿嵌「御製重排石鼓文墨」八字。此外，北京故宮尚有一組〈巴慰祖石鼓墨〉(圖 27)，與上述石鼓墨造型相似，在細節上少了上下緣的鼓釘，且尺寸較小直徑 4 公分，高 3 公分，正反面所刻也與上述石鼓墨相同，為重排石鼓詩及楷書識文，令人不解的是，據描述在最後一鼓即癸鼓的背面有「乾隆甲辰三月歙巴慰祖縮臨」的署款，<sup>79</sup>乾隆甲辰為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此時乾隆尚未重排石鼓詩，何以會出現這樣年代上的差異？是否為後仿之作而錯置年代？尚待進一步察證。

國立故宮博物院尚收有一組〈青金石石鼓〉(圖 28)刻石鼓造型，直徑約 11 公分，與石鼓硯相類，整體比例上石鼓硯較青金石石鼓寬扁，鼓面同樣陰刻「石鼓文」並填金，文字內容與石鼓硯上相同，亦刻有天干編號，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這組石鼓儲於乾清宮西暖閣分成天 725 號「原五個短戊字一個有座帶玻璃罩有屨內空」、天 726 號「有座帶玻璃罩有屨內空」，<sup>80</sup>現在這組石鼓共有九件，按天干排序少了「戊」字號鼓，同點查報告。經目驗此組石鼓深藍色表面顏色不均勻處，似乎是顏色剝落，剝落處及鼓的邊緣皆透出白色，或有小部分缺損處所露出也是白底石質，進一步說，石鼓上的藍色僅在器物本身最表層處，因此這組石鼓可能是由白色石頭經由作色而成青金石色。那志良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就提及：

在乾清宮點查到「石鼓」形物九件，當時點查的人把它們登記為「青金石石鼓」九件，實際上是用普通的石，製成之後，再染上一層藍色。<sup>81</sup>

這與觀察所得相符。由明屠隆《考槃餘事》可知，文房器具中常有「石鼓」造型的「鎮紙」，<sup>82</sup>唯此組石鼓之尺寸大小，作為文房珍玩中的鎮紙顯得略大，也可能是

77 (清)汪近聖，〈乾隆朝供墨〉，《汪氏鑑古齋墨數》，卷二，頁 445-446。

78 在 2008 年 4 月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曾拍出〈御製重排石鼓文墨一套〉，與汪氏著錄相同，相關資料圖版參見網站  
<http://www.cguardian.com/pic.php?sessioncode=&specialcode=PZ0004489&picid=art52362293>。

79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套〈巴慰祖石鼓墨〉，參見網址  
<http://big5.dpm.org.cn:82/gate/big5/newweb.dpm.org.cn/shtml/117/@/6972.html?query=%E7%9F%B3%E9%BC%93>。

80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1 冊，頁 112。

81 那志良，〈故宮也有偽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頁 34。

82 (明)屠隆，〈文房器具箋·鎮紙〉，《考槃餘事》，卷四，收入《叢書集成新編》，頁 80。



單純縮小新刻石鼓做為文房賞玩用。

將這些石鼓文玩（包括兩套石鼓硯及石鼓墨）與新刻石鼓比較，無論材質與尺寸為何，鼓面所刻重排石鼓詩皆是一字不移的翻刻，即空間行列位置皆相同，字體上新刻石鼓、臺北故宮所藏〈石鼓硯〉硯本身與硯盒及前述〈石鼓文墨〉四者在篆字寫法及間架結構相似，接近新刻石鼓上的文字，筆劃字型較古拙，其實與前所提及〈王澐臨石鼓文〉冊的結字篆法相近；北京故宮的〈石鼓文硯〉在筆劃結構與舊石古文出入較大，在筆劃字型更接近小篆，極為工整典正，或許與刻工對於篆字筆法上的認知有關。至於青金石石鼓，雖然內容是乾隆重排石鼓歌，但在空間排列上有甲、丙、丁、己、壬等鼓與前述各類新刻石鼓不同，不僅如此，現存九件青金石石鼓的文字在篆書筆法與筆劃結構與前述其他石鼓寫法不同，如辛鼓第二行第一個「寧」字，又如癸鼓的「癸」字及甲、乙、丙、丁、己、庚、辛等鼓上的「其」字等。上述各類石鼓文玩的出現必定與乾隆重刻石鼓有關，故製作年代，應與乾隆五十五年重刻石鼓同時或稍晚。

#### （四）重刻石鼓在文物仿古上體現的意義

探索乾隆時期仿古器物，是以歷代名品作為模仿對象，「石鼓」做為商周時期的千古重器，自然成為模仿的標的。劉岳曾於文章中所列舉乾隆仿古特點，這些特點正可用來說明重刻石鼓及相關文物：<sup>83</sup>

##### 1. 自覺性與針對性

選擇石鼓重刻，無疑是乾隆自覺性的表現，他有意識的以此千古重器做為考訂研究對象，基於石鼓的重要象徵意義，更站在保存重要文物的立場，下令重刻石鼓，可說是從目標的選定到製作，處處可見乾隆的主導性。相關的各類書法碑刻的出現，到各類珍玩的製作，明顯都是針對並配合乾隆重刻石鼓之舉，又〈欽定西清硯譜凡例〉云：「……仿古各式均出睿裁評定」，<sup>84</sup>正說明乾隆在仿古器物製作上的全然主導性。

83 劉岳，〈玩物仍存師古情——試談乾隆時期宮廷工藝仿古風格的成因與特點〉，《遼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做古文物精品特集》，頁410-414。

84 〈欽定西清硯譜凡例〉，《西清硯譜》，頁3。

## 2. 嚴謹性

乾隆時期各類文物製作是相當嚴謹，就本文論及的新刻石鼓，對乾隆而言是經過再三考證，並對石鼓所存文字加以校讎後，才有重排石鼓文並重刻石鼓之舉。其他各類與石鼓相關文物製做也同樣嚴謹，就如裝裱成卷的重排石鼓序，不僅將序文摹勒上石，更將此卷以織繡完全複製；此外石鼓硯與石鼓墨的製做，儘管材質尺寸不同，在細節處理上一絲不苟，複製出與新刻石鼓相同的表現手法。

## 3. 雜揉性

置於孔廟的新刻石鼓也充分表現所謂雜揉性，首先，就新刻石鼓造型的出現來看，將自唐以來以「石鼓」為名的想像，進而具體化石鼓的造型，所刻文字則取自舊石鼓，並重排石鼓詩，更有別舊石鼓文字刻於鼓腰，將新排石鼓文刻於鼓面，在尺寸上刻意模仿舊石鼓的尺寸，上述皆足以顯示新刻石鼓的雜揉性。另外，以新刻石鼓為母題所衍生出各類文房珍玩（包括硯、硯盒、墨、鎮紙），無論在材質、尺寸及實用性上各有不同，皆顯現仿古文物的多樣性。

## 4. 廣泛性

綜觀所有與重刻石鼓相關的文物，不難發現所涉及的工藝領域是相當廣泛，其中包括書法、織繡、刻石、硯台、漆器、墨錠、墨刻等，都是不同工藝領域製作，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的石鼓硯為例，外盒為鼓型金漆盒，硯臺本身為端硯，是此組硯明顯結合硯臺與漆器兩種截然不同的工藝而成，再看〈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卷，前述此卷裝裱極為講究，色彩華麗的縹絲包首，精雕的玉鸞，滿工的紫檀木匣等，這些配件牽涉各種材質及不同工藝，是乾隆時期製做文物集大成的典型。

# 結 語

早在唐代出現於天興縣的「石鼓」，因其刻石年代久遠，所載多與西周禮樂制度相關，字體又是大篆文字，故長久以來即被稱為中國古代身一刻石。雖然，此一刻石的正確年代，自唐代以來即有著許許多多不同地說法，學者之間亦莫衷一是。

然而，何以乾隆皇帝在八十大壽前夕，他要大費周章地考訂石鼓、重刻石鼓，其間似乎透露出某種不尋常地訊息。從本文〈表二〉可知，雖然乾隆皇帝揚石鼓於

乾清宮一事，發生在乾隆十四年，得元榻石鼓則發生於乾隆四十八年；但是，乾隆皇帝種種關於考訂石鼓、重排定石鼓次序、重刻石鼓等事件，卻密集地發生於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之間，甚至於乾隆皇帝更選擇在他八十大壽當天（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寫出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這樣一篇重要的文章，確實意義不凡。

在乾隆五十五年以前，乾隆皇帝完成了他對外「十全武功」中的八項事功，在文化事業上，也完成了編纂《四庫全書》與滿文翻譯之《全藏經》，此時的乾隆，距離「文成武德」之輝煌目標，已不遠矣。不過，從幼年時代即曾接受過深厚儒家教育的乾隆皇帝，深知自己要真正成爲一個文成武德的「聖主明君」，尤需額外戮力，「重刻石鼓」成爲乾隆皇帝欲達此一目標的不二選擇。

「石鼓」本屬上古文物，又被後世譽爲「天下第一刻石」，若依唐代大儒韓愈的見解，它更屬於西周中興英主周宣王時代的刻石；故乾隆皇帝認同韓愈此一說法的因素之一，即以暗喻自己也是大清時代的「中興英主」。其次，乾隆之所以會在衆多關於石鼓的刻石年代的說法中，力排衆議，獨取韓愈關於周宣王時代此一說法的另一原因，乃因韓愈不但是中國古代「道統說」的創立者，並以上承道統爲己任，然則，乾隆皇帝的認同韓愈（甚至加封韓愈爲五經博士），不正也是暗示自己可以上承道統嗎？當一位在位天子，自詡爲「中興英主」與「道統繼承者」這兩種重要的身分時，他不也就成功地形塑了自己是個文成武德的「聖主明君」之歷史定位。

於是乾隆年滿八十歲開始，進入歸政倒數階段的同時，也就更積極在文治上有所建樹，先選定極具代表性的石鼓重刻，此後的幾年中，也都針對這些儒家經典有立碑刻石的動作，同時不斷在文字中強調歸政在即的同時，他是如何兢兢業業地想要成爲一個「文成武德」同時又「典學勤政」的聖主明君，透過一連串與文化經典相關活動，如重刻石鼓與十三經刻石，乾隆提醒世人，武功上他是十全老人，文化上的建樹也不遑多讓。

至於隨著乾隆此一形塑己身歷史定位而來者，亦即嗣後的「以古爲本」、「以古創新」種種附隨著重製石鼓而來的書法、刻石或珍玩，除了具備有古文物、書法的再詮釋此一歷史意義之外，其他衍生出各類石鼓可用來說明乾隆時期仿古文物製作的特點，然無論種類爲何，還是可回歸到乾隆皇帝有意識形塑己身歷史定位（文成武德之「聖主明君」）的角度，更能真正瞭解此中真意。

附記：本文寫作期間，感謝器物處同仁，在目驗兩組院藏石鼓文物上給予許多寶貴意見及協助。書畫處梅韻秋與賴毓芝兩位女士提供相關資訊及參考資料。特此致謝。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漢)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唐) 韓愈著，(宋) 魏仲舉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收入《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1999。
- (明)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 屠隆，《考槃餘事》，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 楊士奇，《東里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 楊慎，《石鼓文音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 189，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 楊慎，《金石古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98，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 蔣德璟，〈石鼓小記〉，收於黃宗羲編，《明文海》，卷 376，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文慶、李宗昉等纂，《欽定國子監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 (清) 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 汪近聖，《汪氏鑑古齋墨藪》，收入《墨譜集成》，冊 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清)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 清高宗，《御製文集》，三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清高宗，《御製詩集》，五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西清硯譜》，上海：上海書店，1993。
- (清)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趙秉冲列傳〉，《清國史館傳稿》，1286 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723-1911。

### 二、近代論著

-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臺北：元久文物藝術顧問有限公司，1993。
-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1。

-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康無爲，〈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品味與異國奇珍〉，《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17-229。
-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
- 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2 期，2000 年冬季，頁 61-116。
- 賴毓芝，〈文化遺產再造：乾隆皇帝對於南薰殿圖像的整理〉，《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4 期，2009 年夏季，頁 75-102。
- 劉岳，〈玩物仍存師古情——試談乾隆時期宮廷工藝倣古風格的成因與特點〉，《遼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倣古文物精品特集》，澳門：澳門藝術館，2005，頁 410-414。
- 劉恒著，《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
- 中田勇次郎，《石鼓と秦漢の碑刻》，京都：文字文化研究所，1989。
- Mei, Yun-chiu.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 **Molding a Great Emperor and Re-explain Antiques: Discussion on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carving the Stone Drums**

Hou Yi-li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The “Stone Drums” was one of the few sets of surviving engraved stones from China’s revered Three Dynasties of antiquity and served as an important symbol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the 55<sup>th</sup>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corresponding to 1790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Qianlong Emperor at the Chinese age of 80, he ordered the remaining 310 decipherable characters to be assembled and rearranged into ten “Stone Drum” poems and also engraved new set of “Stone Drum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how the Qianlong Emperor using recarving the Stone Drums and engrav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o declare his authority on Chinese orthodoxy. Here are few sets of drum-shaped studio objects and their forms and characters of these “Stone Drums” vividly express the features of archaism and innovation sought in the Qianlong era.

**Keywords:**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Stone Drums, Chinese Orthodoxy, Archaism



圖1 石鼓（吾車）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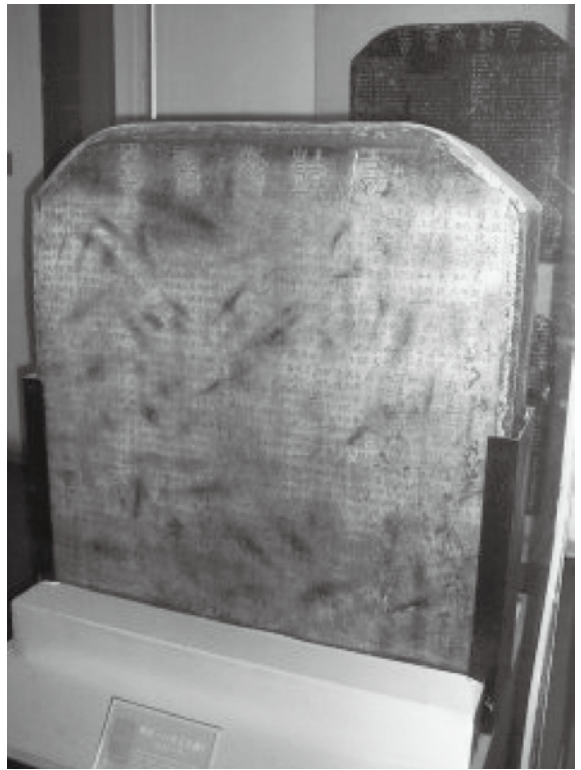


圖2 元潘迪 石鼓音訓碑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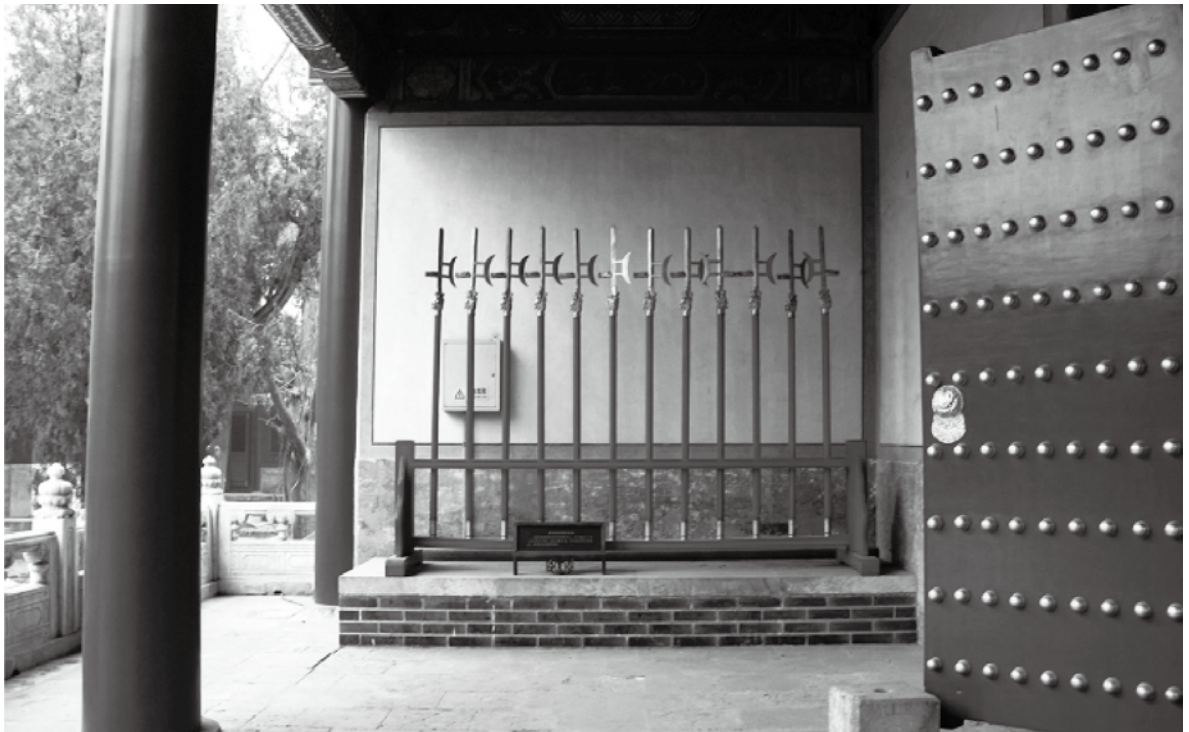


圖3 北京孔廟大成門內原放置舊石鼓處 取自北京古都文化歷程資源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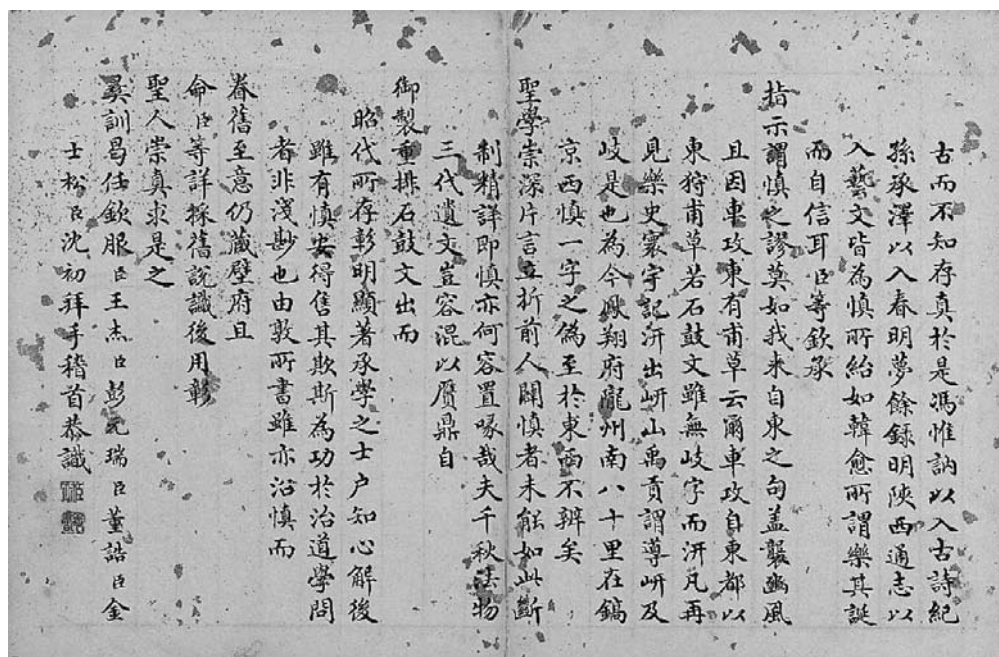


圖4-1 汪由敦 臨石鼓全文冊後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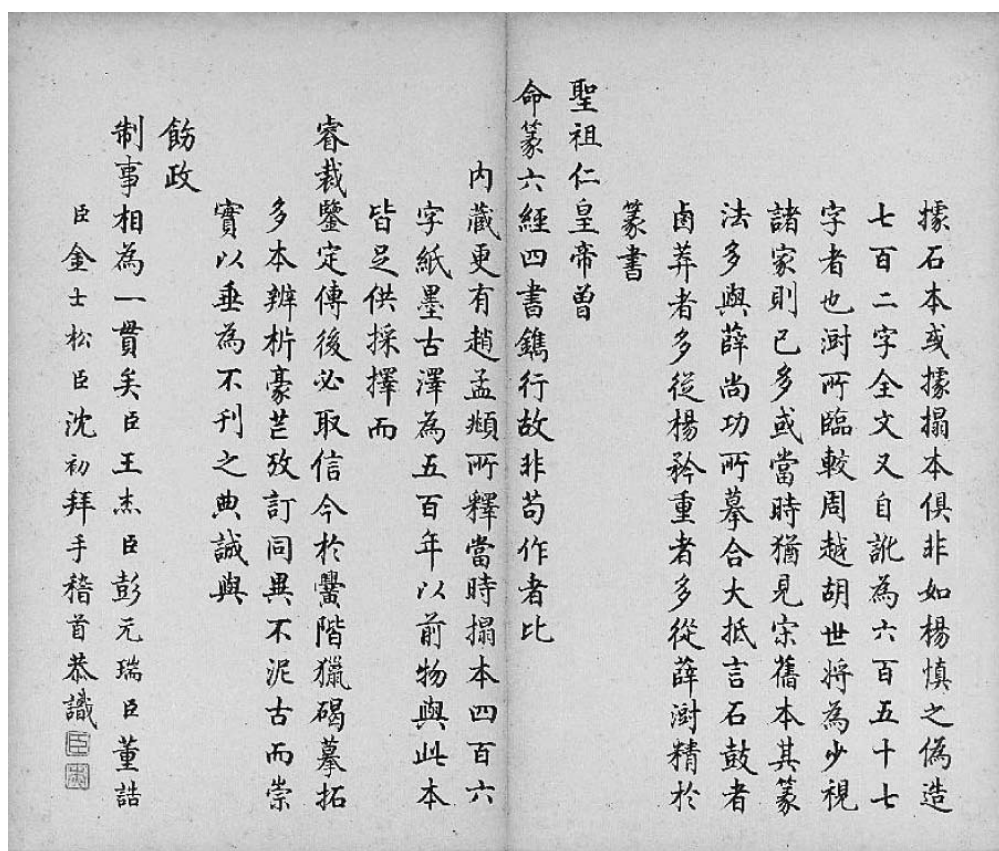


圖4-2 王澍 臨石鼓文冊後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1 北京孔廟大成門東楹乾隆石鼓 取自北京古都文化歷程資源網站



圖5-2 北京孔廟大成門西楹乾隆重刻石鼓 取自北京古都文化歷程資源網站



圖6 熱河文廟石鼓 邱士華攝



圖7 清乾隆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 賴毓芝攝



圖9 御題張照書韓愈石鼓歌碑 賴毓芝攝



圖8 御題張照書韓愈石鼓歌碑額拓片 取自北京記憶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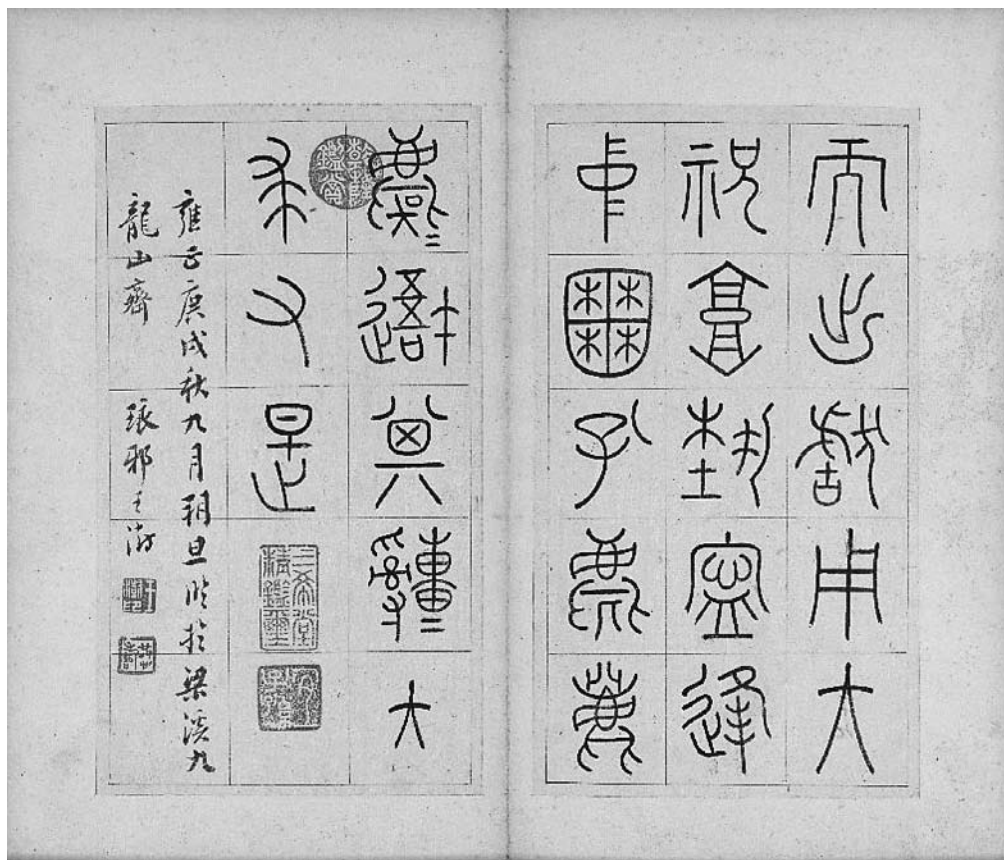


圖10 清王澐臨石鼓文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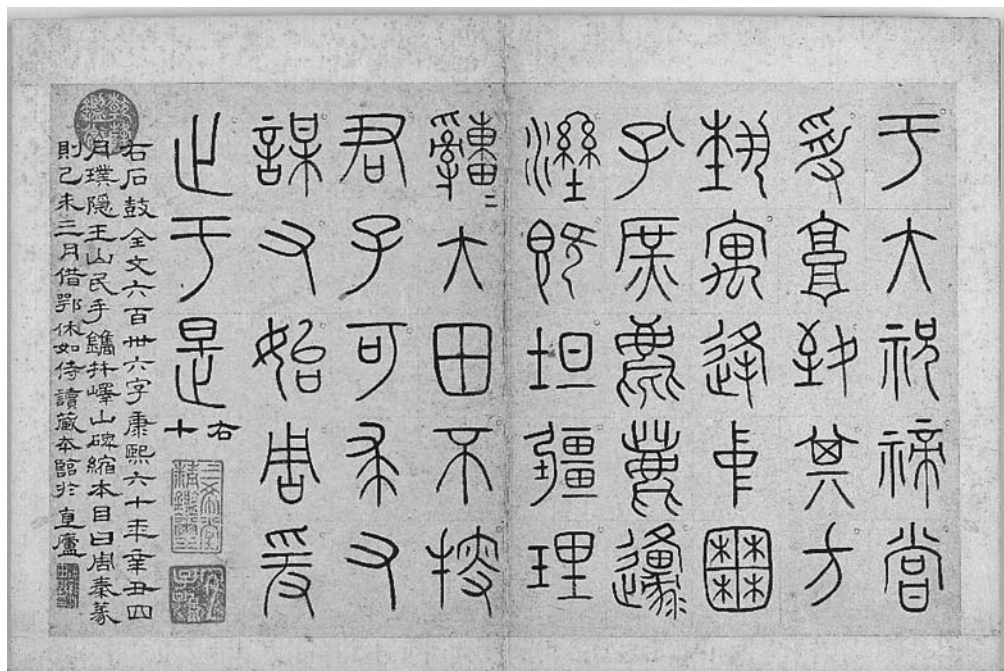


圖11 清汪由敦臨石鼓全文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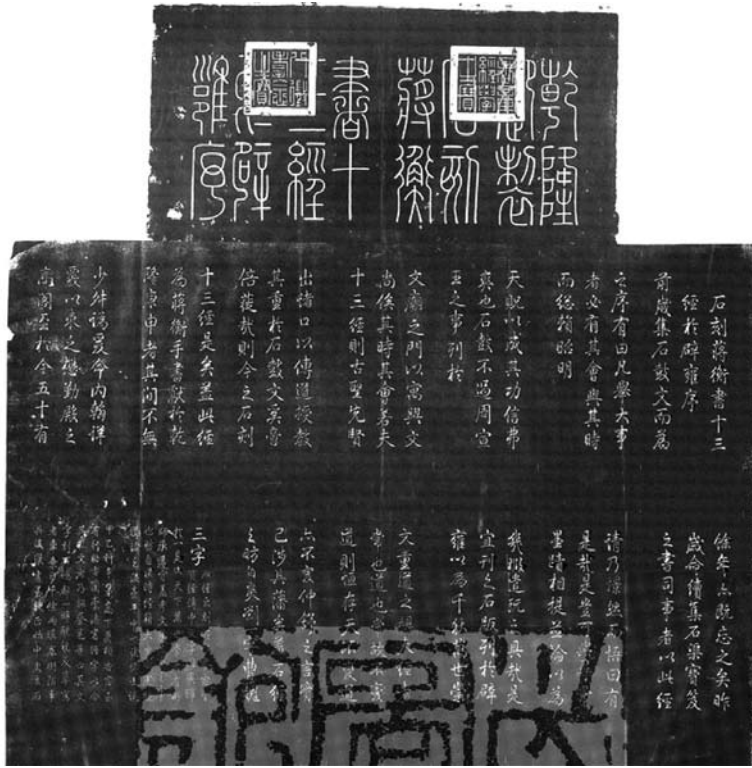


圖12 御製石刻蔣衛書十三經於辟雍序碑拓片（局部） 取自北京記憶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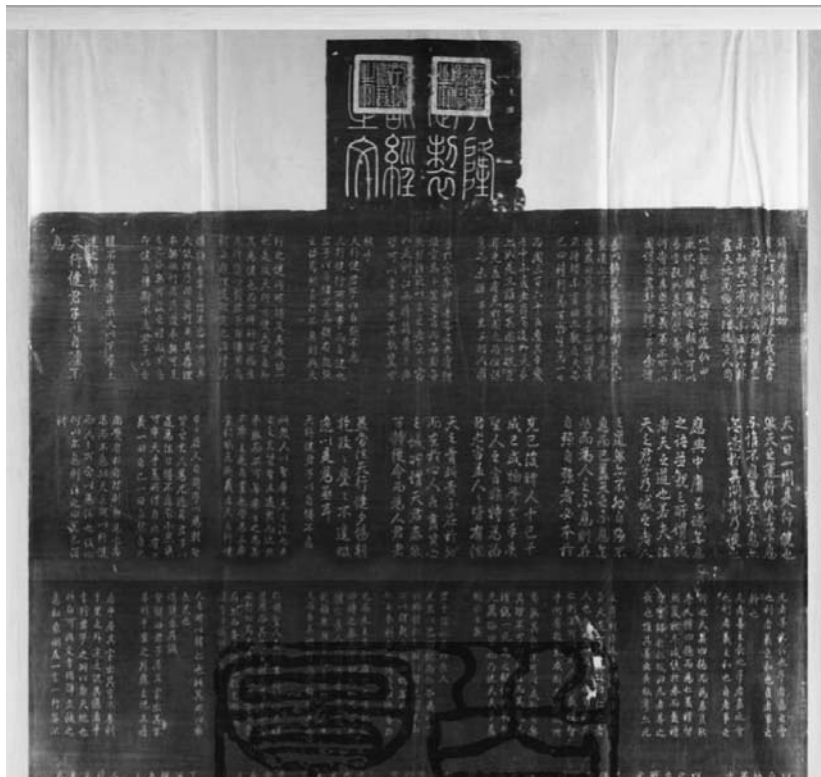


圖13 乾隆御製說經之文碑拓片（局部） 取自北京記憶網站





圖14 乾隆重刻石鼓（甲鼓） 賴毓芝攝



圖15 清乾隆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 碑陰題名 賴毓芝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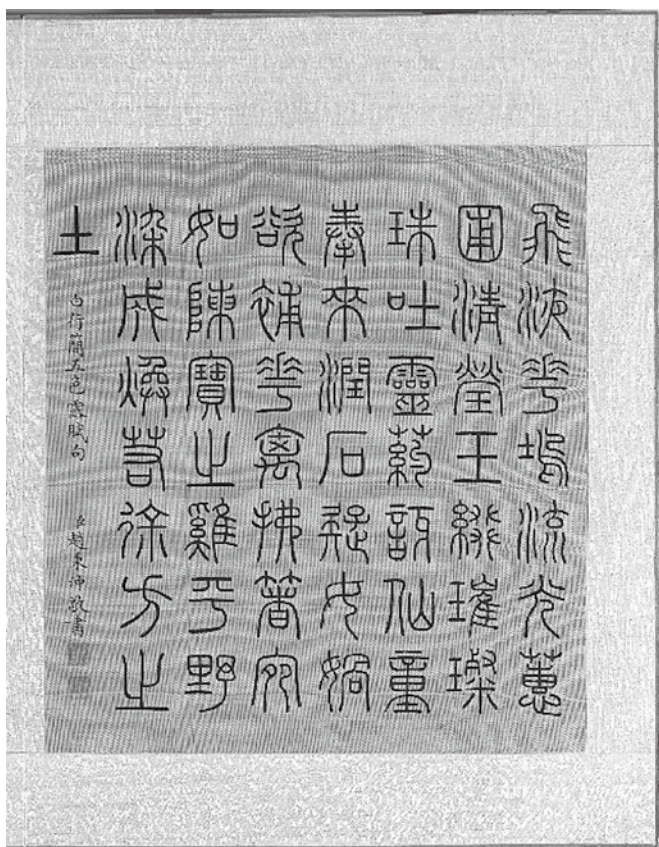


圖16 清趙秉冲 篆書 白行簡五色露賦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清乾隆 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卷之紫檀木匣 取自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網站



圖18 趙幹江行初雪之紫檀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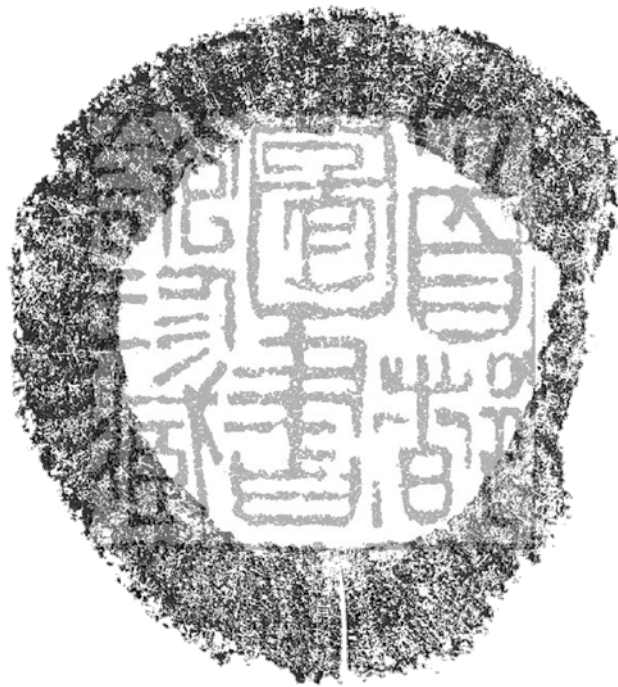


圖21 第六鼓石鼓鼓面刻「御題詩跋」拓片  
取自北京記憶網站



圖22 漢玉璧插（齊家文化玉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清乾隆 石鼓硯及硯盒（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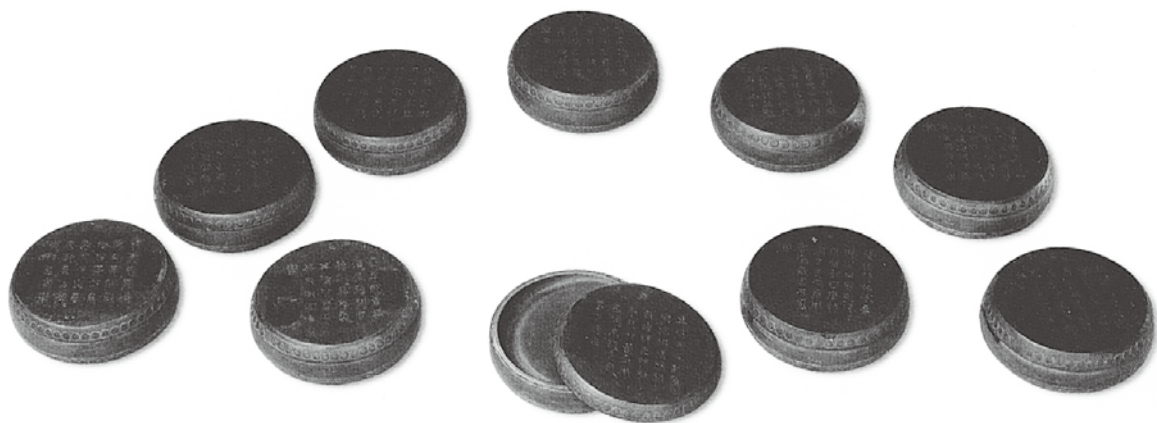


圖24 清乾隆 端石做古石鼓文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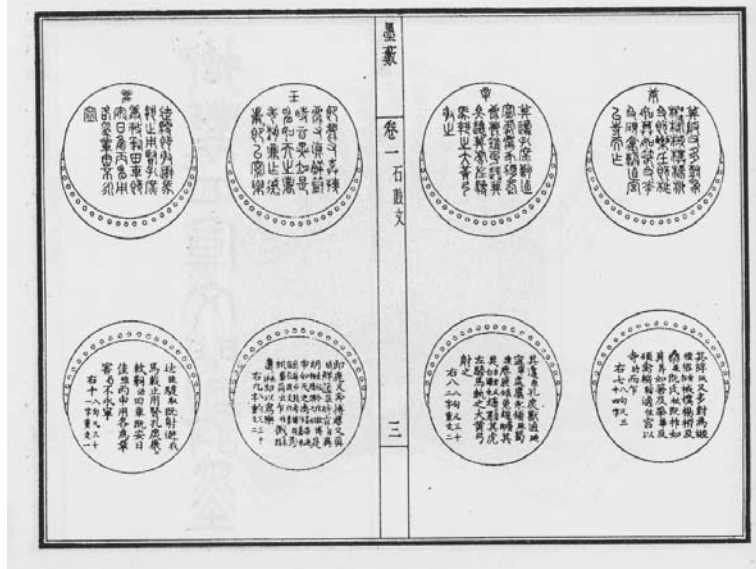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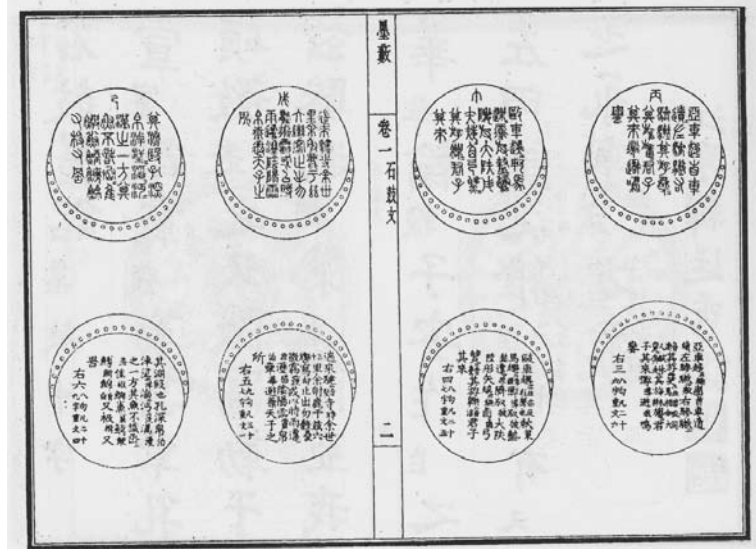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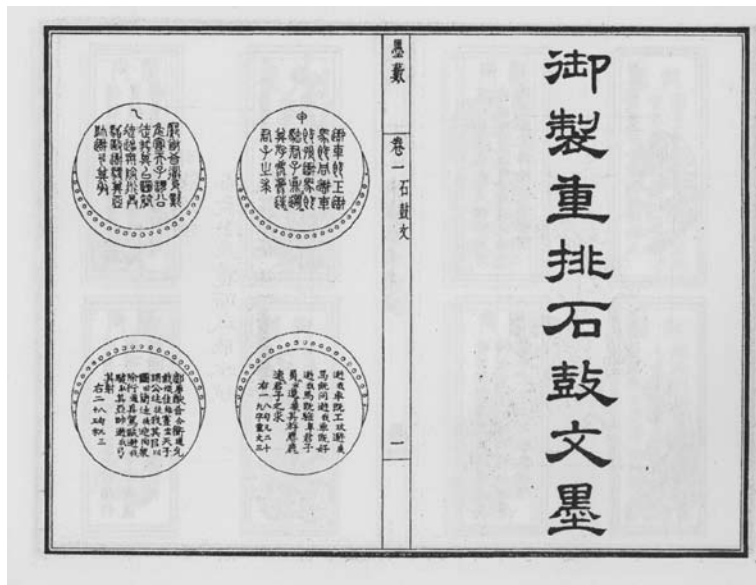


圖25 清汪近聖 御製重排石鼓文墨 鑑古齋墨叢



圖26 清乾隆 御製重排石鼓文墨 取自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



圖27 清巴慰祖 石鼓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清青金石石鼓（乙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